

关于闻一多的一篇佚文——《晨夜诗度·跋》

陆文婧

前不久，我发现了一多先生的一篇佚文——他为彭丽天的新诗集《晨夜诗度》写的《跋》。这篇《跋》，似少为人知，不仅《闻一多全集》未收入，连有关闻一多的年谱、传记、论著也未提及。

众所周知，闻先生是一派诗宗。他影响、鼓励和帮助过一批青年诗人，彭丽天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彭在《晨夜诗度·后记》中说：“我在此尽忱谢闻先生给我许多的教益和帮助。”闻先生在《跋》中还说：“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，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，自己热心作，也热心劝别人作。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，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。”《晨夜诗度》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，这时，闻先生虽然已停止创作，但他仍然作为这个诗集的发行人，使它得以问世（代售处是北平佩文书斋），还为它作了《跋》，加以介绍。

《晨夜诗度》分上、下篇，上篇收诗十九首，下篇包括一首童话诗，一篇剧诗。写作的时间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。闻先生对诗集作了热情而又有分寸的肯定：“这里有独到的风格，有种种崭新的尝试。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，这里有着的几条蹊径，似乎都未经人涉足。”关于“种种崭新的尝试”，从体裁上说，大概是指童话诗、剧诗而言。彭丽天的童话诗《一个旧传的故事》共二百九十余行，在此之前，象这样的长篇童话诗极其少见；至于诗剧，早在“五四”时，郭沫若就已经有了成功的创作，后来柯仲平等也作了继续努力，但作者和作品都不多，彭丽天是这少数作者中的一个。这本诗集中的其他诗形多为自由体，句式长短不一，有的一句诗分隔转行排列，有的一行多句诗，使诗的节奏十分活泼。至于在诗歌艺术的其他方面，《晨夜诗度》也有所贡献。

应该指出，如果从政治的角度说，《晨夜诗度》既无民族灾难的呼喊，也少革命的声响，但有对正

义的颂扬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，有对邪恶的憎恨，以至对压迫者的复仇。诗剧《庞琪》虽未具体点明事件发生的具体年月，但无疑是有感于现实而发。这个诗剧将诗的抒情性与剧的叙事性相结合，表现了人民的苦难。青年农民庞琪在天旱之年背井离乡，流浪在外，后发现自己的恋人成了县长的妻子，县长以势欺人，将庞琪几乎打死。后来，庞琪身体康复后又一次与县长拚斗，最终身陷囹圄。感情倾向是明朗的。剧诗中“中年歌者”唱道：

啊！我们的国度到处是
压榨下的死伤和饥馑的流亡，
荒芜的田野接荒芜的田野，
干枯的土地吮着都市的长咀。
腥膻的地方，有夏雨
浣洗不净的血污，春风吹不破的忧郁，
上帝的眼里没有光荣和欢娱，
只有慈悲的斜阳怜悯这世界的末日。

这酷似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现实。

童话诗《一个旧传的故事》中的国王，相信胡调的谎言，放逐了说真话的丞相。这诗不仅对儿童即使对成年人也同样具有吸引力。诗集上篇所收十九首诗，多系抒写个人情怀之作，其中有“乡梦带着烦闷”的回想（《十三夜有梦》），也有“想起往事就是愉悦的一缕风”的《忆》；有写“失落感”的苦涩之作（《别》）；也有赤子念母的炙人热梦（《秋讯》）；有心弦颤动的爱，也有由爱而牵起的嗔怒，还有萌发于爱的美丽想象；有的是寄情名山、旧都（《访岱记》、《旧京》）；有的是悼念至交（《悼一个朋友》）。诗中那些少许写到人民生活的艰难，沉重，及向往光明，努力振作的笔墨，已是抽象成具有象征意味的几个形象：如《老驼夫》和《大车》中的负重者和推车人，《秋》中的秋风，以及诗化了的信念，“我怀抱着这寒冷，更思念起春风。”与其说这是反映现实，倒不如

说是作者诗化了的生活感受。彭雨天，这位由闻先生邀上诗之路的作者的诗，在艺术个性、艺术技巧、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。象《别》这样的诗篇，显然是师承闻先生讲究意境，追求“音乐美”的典型之作：

太阳照上山头了，
令令
我得
我挽着马儿走了。
我得
令令
我为什么躊躇，啊，莲那？
我忘了什么？
我失落了什么？我说不出。

此景此情，加上一唱三叹的旋律和象声词的运用，把抒情主人公难以言说的别离“失落感”渲染出来了。《忆》诗画合一，绘画美特别突出，试看诗的后一节：

当你的额后白发靠近了夕阳的窗口，
静听有谁来敲这寂寞的门户，
想起往事就是愉悦的一缕风，
掀起无数重彩色的窗帘，光影里

《晨夜诗度·跋》

这是一个人六年中的成绩，其间也并未以全副精力费在这上面，但这里有独到的风格，有种种崭新的尝试。新诗在旁的路线上现在已经走的很远了，这里有着的几条蹊径，似乎都未经人涉足。正因旁人不走，道上许太嫌冷落，所以这本书的出世，才需要我来凑凑热闹，说得郑重点，便是作个介绍。然而奇怪为什么作介绍的乃是一个对走任何道都无兴趣的人呢？说来却是一段因缘。当雨天初碰见我的时候，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，自己热心作，也热心劝别人作。雨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，总算是因为我

飞起了那一只来回玄燕，是忆。

这里，把抽象的情感活动，描成了一幅新颖的图画。在艺术的构思、想象、表现手法上都有新意。闻先生对此诗集的肯定，正是从诗歌艺术的发展角度肯定它在艺术上的创新之处。闻先生在此之前作的《烙印·序》（1933年7月），和在此之后作的《西南采风录·序》（1939年3月），都强调诗的社会价值，在四十年代作的《时代的鼓手——读田间的诗》，更是突出了诗在民族危难之际的“战鼓”作用，而《晨夜诗度·跋》侧重肯定其艺术。这表明闻先生的诗歌思想的丰富性。闻先生诗歌思想虽有前后期之分：由注重诗的内部特质（如诗的“三美”，诗中的时代精神，地方色彩等），转向强调诗的外部社会价值，但《晨夜诗度·跋》的出现，无疑给我们两点新的启示：其一，对闻先生这样的大作家，要注意全面的研究其论著，切不可仅仅根据部分文字作判断。其二，对闻先生这样影响较大的作家，要注意发现那些受其影响，与之诗风相近或相似的诗人和作品。

《晨夜诗度·跋》浸透着一股溢于言外的温爱，表现了闻先生对一个无名诗人的真切的关怀和无私的支持，是我们研究闻先生文艺思想、诗歌理论，以及人格和品质的重要史料。

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。不料把他（还有不少别的人）邀到了那里之后，我自己却抽身逃了。我之变节，虽有我的理由，但想起这些朋友们，总不免感着一种负心的惭愧。现在雨天愿意将已往的收获印出以告一段落，便为替自己赎罪计，我也不能不趁此说几句话。也许这是我对新诗最后一次插嘴的义务罢！

闻一多

民国二十六年，四月，六日。